

贝熙业与近代中国隐秘传奇(下) ◆ 罗屿

1939年2月,黄浩收到一份需要马上筹备的药品清单,数量巨大。此药单为白求恩到冀中军分区视察后开出,需不折不扣完成。

经多方努力筹到药品后,黄浩找到贝熙业,此批药仍要靠他从北平城内运到城外西山。

一天,下午四点,贝熙业的雪铁龙汽车经过西直门城门,关卡中的日军、伪警察都知道,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院长贝大夫的车,随即招手放行。

雪铁龙一路疾驰,到达贝家花园。此后,与往次一样,在贝宅等候多时的地下交通员接到药,立即套上驴车,翻山越岭将药品送到根据地。

三天之后,当那些在上海、香港都罕见的德国拜尔生产的贵重药品及医疗器械摆在战地医院的药架上时,白求恩跷起大拇指连声称赞:“了不起!”

几年后,汽油成了战略物资,贝熙业的汽车无法开了。为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贝熙业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从城内到贝家花园有40多公里路,沿途还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在西山夜色初上的星空下,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白色八字胡的外国老人风尘仆仆地骑行在蜿蜒的山路上。

除运送药品,贝熙业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支持着抗日。1941年12月,他收留了为躲避日本宪兵而开着校长司徒雷登汽车逃离校园投奔他的燕京大学英国教授林迈可。和贝熙业一样,林迈可同样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最终,林迈可从贝家花园再次出发,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他的帮助下,1944年8月,延安建成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和印度的大功率国际电台。9月1日,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

1943年8月黄浩暴露,贝熙业第一时间找人将他接到贝家花园,并在那里把他送往抗日根据地。黄浩走后,贝熙业和其他中共党员对接,继续用自行车运送药品,他还在贝家花

园治疗前来求医的负伤八路军战士,有时还会进山出诊。

重回人生起点

遗憾的是,贝熙业以一己之力为抗日所做出的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史料中只有零星记载。

这多少缘于新中国成立后,贝熙业一度尴尬的处境。

最初,北京的政治气氛是宽松的,选择留下的外国人依旧行动自由。贝熙业也对新政权充满信心。共产党身居高位的官员中,有许多和他打过交道,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都是当年参与赴法勤工俭学潮,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更为重要的是,贝熙业已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当亲友来信劝他回国时,他回信表示,“这里缺医少药,我的病人都离不开我,我的职责让我继续留在这里。”另外,贝熙业也在中国等来一份迟来的爱情——年轻女画家吴似丹走入贝熙业的生活。1952年,80岁的贝熙业和28岁的吴似丹登记结婚。

但造化弄人,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开始逆转,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内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看待在京外国人的眼光开始异样。另外,由于此后法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留在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失去了外交地位,贝熙业不再担任教授和校医职务,只能成为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随后破获的几起国际间谍案,更让贝熙业处境艰难。由于间谍案主角,都曾与贝熙业来往过密,人们开始怀疑他对新政权的态度。

此后一天,北京市卫生局找上门,来人客气地与贝熙业商量:您现在年事已高,每周也看不了几个病人,要不然把诊所关了?贝熙业听从建议,关闭了诊所。但之后不久,公安局找上门,带来的正是那封让他感觉如晴天霹雳的信——既然你已不再行医,除非加入中国国籍,否则没有理由待在中国。



结婚照
贝熙业与吴似丹

不愿放弃国籍又无计可施的贝熙业面对公安局日益急切的催促,最终痛下决心,收拾行囊。1954年10月1日,当全国沉浸在建国5周年国庆的喜悦气氛时,贝熙业和吴似丹黯然登上前往法国的邮轮。

回国后,因为经济窘迫,两人根本无法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前贝熙业一时冲动在奥维涅新浴堡买下的那块山地,成了他们此时唯一的落脚之处。

新浴堡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贝熙业夫妇在亲友的帮助下,建起一栋小木屋。82岁的贝熙业用几十年来一直拿手术刀的手,举起锤头铁镐,开荒垦地。渴了,饮一瓢山泉水,累了,就在树枝搭起的窝棚小憩。

曾经的辉煌已如过眼云烟。贝熙业重回人生起点。唯一的惊喜是,1955年吴似丹竟然怀孕了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让-路易。

1958年贝熙业去世,吴似丹34岁,让-路易3岁。在奥维涅这个封闭的小村庄,人们看让-路易这个混血儿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幸,让-路易学习优异。他选择跟随父亲脚步,在15岁时考上了海军医科学学校,从此离开奥维涅,此后成为知名心血管专家。

内向、孤僻的吴似丹余生都守着她和贝熙业最后的家。丈夫去世后,她一直靠卖画和给人打零工补贴家用。

1983年,让-路易陪母亲回过一次中国,仅仅是看望亲友。1992年吴似丹又独自回了一次北京,她前往西山,却未能进入贝家花园,只在附近留下几张伤感照片。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绝的科举制产生的其中一个举人——安徽曹守常,中举后带领庞大的曹氏家族从安徽来到苏州河畔,历史没有说明,曹举人因什么原因而将祖业、老宅抛却前往数百公里之外的上海,显然,他们的到来让这个地域中产生了一个自然村落,村落叫曹家宅。万历年间,曹家宅附近的苏州河畔,有了一个渡口,称为曹家渡。那时,只有渡口而没有桥梁,曹杨路桥,又叫三官堂桥的出现要到很久以后的1928年。

之前,大清国宣统三年,即1911年,真如老镇上居住的杨杏堤,在杨树浦一地入股了达丰纺织印染厂,又担任了厂长一职。民国8年,也即1919年,工厂出品的“达丰卡其”一点也不输给洋布,不仅行销全国,甚至还远销东南亚等地。

杨杏堤发了大财,便想到要回馈社会。上世纪20年代初期,曹先生捐出大把银子在曹家渡的渡口一边建起了一座木桥,因木桥的南堍下有座三官堂道观,故而此桥又叫三官堂桥。可以想见,曹家渡这个渡口,成名很早,但废去也早。当杨杏堤拿出银子建造木桥后,它便应声而去。

继续沿河而去,曹家渡之后,便是强家渡。大清国道光七年,也就是1827年间,在吴淞江南岸的强家角村,有不少农民合伙捐资修建了强家角渡口,这些农民没有在历史上如曹守常、杨杏堤那般地留下自己的姓名,不过他们还是留下了渡口。

在强家角渡口附近居住的人们,对这个渡口,自然保有许多生动的回忆。许多人都记得这样一幕:当年娶媳妇时,渡口上的小船,很殷勤也很热烈地装运着女方带来的简陋嫁妆,尽管简陋,但那也是构成小两口人生中的一部分,至今记忆犹新;也有居民记得,那时,无论天有多黑、夜有多深,家里发生急事,需要由此岸去往彼岸,你只需在渡口边喊上一声,渡船师傅立马从温暖的被褥里爬起,二话不说就将方头渡船摇将过来。

平日里,强家角渡口的运营时间还是有严格的规定:早上5点到晚上11点,每七分钟一个来回,白日渡人将近3000。“八一三”没有开打之前,强家角渡口已归私人经营,私人便是所谓的渡口大佬。

42.可以接受审判了

比利的八字胡在第一与第二次强奸案之间刮过一次,但后来又长起来了。现在,他再度失去了时间感,出现在了哈丁医院和富兰克林郡监狱最后几天时的奇怪感觉。里根和阿瑟的人格仍然是独立的,除非确定不会被送回监狱,否则他们拒绝与其他人格融合。目前的比利,至少已经完成了部分融合,可以接受审判了。

虽然他知道自己并非纯粹的比利或完全融合的比利,但当别人称他为比利时,他仍会回答。他目前处于两种状态之间。他不知道完全融合后,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他走向停在医院门口的警车时,发现副警长正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望着自己。在前往法院的路上,警车故意绕路以摆脱可能尾随而来的记者。但是,警车刚到监狱门口,一位女士和一位手提摄像机的男士还是在大门关上之前挤了进来。

“到了,比利。”驾驶员打开了车门。“我不下车,”比利说,“除非记者和录像机都撤离!如果不保护我,我就通知我的律师!”驾驶员转身发现了那两个人:“你们是谁?”“第四频道新闻部,我们有许可证。”驾驶员看看比利,比利摇摇头:“律师说我不能接近任何记者,我不出来。”

“嘿!朋友,”威利斯警官说,“你们必须离开,我们才能让他下车。”记者不情愿地离开后,比利才下车由威利斯带他进门。屋里,警长的黑衣助手们聚在一起看着比利被带进去,威利斯走在前面,为比利开路。

威利斯一面带他上三楼一面问道:“还记得我吗?孩子。”走出电梯时,比利点点头:“你尊重我。”他们走到紧邻小接待室的入口处,准备从那里进入法院大厅。警卫向他点了点头:“少了八字胡,快认不出你了!”然后按铃通知中央控制室开门。

门开了,几个法警为比利搜身。“好了,”一位法警说,“走我前面,沿着过道走。”

到达法院七楼时,他们看到了在那里等候的朱迪和施韦卡特。两个律师发现比利的八字胡不见了。“没胡子好看多了,”朱迪说道,“更干净。”

除了外形有些像中国人,对让-路易来说,中国仿佛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吴似丹一直对儿子闭口不谈他父亲在中国的过往经历。

直到2011年,法国驻华使馆联系到让-路易,告诉他其父贝熙业离开中国时,有一批古董未能运走,一直存在使馆,希望他能来华处理。得知此事后,让-路易开始有了了解父亲在华经历的愿望。

此后,就有了他和张伟、张同道等人的接触。让-路易更加想不到的是,2014年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由张伟起草报回国内的贝熙业的经历,成为到法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讲中的素材,贝熙业的名字两次被提到。习近平主席称其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在张伟安排下,让-路易作为友好人士,被习近平接见。

此后第二天,让-路易去往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西山,走进父母相识相恋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而那时的贝家花园,已不是导演张同道开启贝熙业寻访之旅时,所见到的荒芜样子——“远远望去,一片密林托出一座孤独的楼顶……院里杂草丛生,秋千架只余铁环兀自悬空。回身向南,上一小台,是一座中式平房,也被封锁。”

2013年5月,贝家花园被北京市名城委员会办公室列入保护试点,在海淀区政府的支持下修缮一新。

这一切,是否会让贝熙业心有慰藉?毕竟,他对自己在中国,这个他视为第二祖国的地方,所获的荣誉是那样珍视——让-路易记得,他曾在整理父亲资料时,发现一张贝熙业写于1953年的便条:

“我刚翻阅了我的资料,它们未加整理,我已习惯了这种杂乱。”

我关上抽屉,也许永远不会再打开它。

我忽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或孙子辈会再看到它们,会因此知道这里面珍藏着我在在中国漫长岁月中得到的小小荣誉。”

摘自《小康》2015年08月上

比利将手指指在嘴唇上。施韦卡特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正要开口,一位手持对讲机的警官走过来抓住比利的胳膊,说警长要比利到二楼去。

“等一下,”施韦卡特说,“审判地点在这儿。”“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警官说,“但警长让我立刻带他下去。”“你在这儿等着,”施韦卡特对朱迪说,“我和他一起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施韦卡特、威利斯警官和比利一同走进电梯。电梯到达二楼,施韦卡特在电梯门开启之际便立刻明白了——闪光灯对着他们,是《哥伦布市快报》的记者和摄影师。“这是搞什么鬼?”施韦卡特吼道:“骗子!快住手!你无权对我的当事人这么做!”他带着比利转身进入电梯。

他们随后来到审判庭旁的休息室。特纳和卡洛琳这时也赶到了,她们拥抱比利以示安慰。她们离开后,休息室里只剩下比利和威利斯警官。这时,比利开始发抖,双手紧紧地抓住椅子的两侧。“来吧,比利,”威利斯说,“你现在可以进去了。”

比利被带进法庭时,在座的所有素描画家无不睁大了眼睛,随后迅速拿起橡皮开始猛擦。看到这个情景,施韦卡特忍不住笑了,因为他们擦去的是比利的八字胡。

“法官先生,”施韦卡特靠近长椅说,“检察官和被告都已同意不传唤证人,比利也不用站在询问席上。案情经过采用宣读的方式,这是双方的一致意见。”

弗洛尔法官看了一眼字条:“就是说你不反对检方的指控,而你的当事人除了性攻击之外,承认其他被指控的罪名?”“是的,法官大人。但是,因为被告患有精神病,我们希望他能获判无罪开释。”“亚维奇检察官,你对西南心理康复中心和哈丁医院的报告是否持有异议?”“亚维奇检察官起身说道:“没有,法官先生,我们对哈丁、特纳、考尔医生以及科尼利亚博士的报告均无异议。根据这些报告,被告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犯罪的。”

朱迪宣读了被告的证词,由书记官做了记录。她一边念一边用眼睛瞥着比利看到他的脸色苍白,十分担心他会因精神痛苦而再度出现人格分裂。

二十四比利

【美】丹尼尔·凯斯

